



钱江奔涌向大洋

(上接4版)

习近平却洞察发展大势,深刻地指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个区域开放的基础,更是海洋经济与海岛发展的“牛鼻子”,发展海洋经济,首先要加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

早在2003年1月,习近平顶着凛冽寒风,首次赴舟山调研时就强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连岛大桥如果建起来了,对舟山的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推动,对全省的布局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调整作用。无论从长三角经济发展推动方面,还是我们生产力布局调整方面,都会有积极的变化。

设施联通,后来成为习近平开放发展思想中“五通”的重要内容。

仅4个月后,习近平再次登岛调研,最让他牵挂的是跨海大桥。他专程到金塘岛,察看了跨海大桥的选址,听取汇报。他叮嘱舟山干部群众:舟山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桥头堡,舟山连岛工程不能单纯从解决舟山交通不便的角度来看待,而是海岛与内陆的重要纽带,是宁波舟山港一体化的重要纽带。

习近平一一过问舟山连岛工程的建设情况,并明确安排了由省交投、舟山和宁波三方共同担当工程的投资主体,解决资金难题。

2004年9月,习近平三赴舟山、再问大桥,明确要求连岛工程快马加鞭,争取早日建成。

东海明珠一线串,千里江陵一日还。2009年12月26日,在习近平殷殷关切、朝督暮促下,历经十年建设,总投资超过130亿元,绵延近50公里的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全线通车,从舟山本岛启程,跨越里钓、富翅、册子、金塘四岛,于宁波镇海登陆,全程仅一小时。舟山从此正式融入国家高速路网。

凭借连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水深港阔的黄金岸线,舟山挥动长袖、登台起舞。2011年,全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舟山群岛新区设立,2016年,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落地;今年4月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舟山乃至浙江,开放发展水平再迈新台阶。

舟山金塘岛,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集装箱集散枢纽。宁波舟山港大浦口码头雄踞杭州湾南岸、甬江入海口之间,离宁波北仑仅一箭之遥。今年1月至7月,集装箱吞吐量达65.9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4.2%。去年签约的中澳现代产业园项目正如火如荼、大干快上。金塘岛,一个以国际集装箱中转、储运和增值服务为主,兼顾海洋装备制造、大宗商品中转储运加工的“国际物流岛”初展雄姿。

舟山衢山岛,一座超级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一艘艘超大型矿砂船频繁靠泊,来自全球各地的铁矿在此汇聚,而后搭载不同吨位的散货船,水水中转,深入长江经济带腹地。仅今年上半年,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接靠40万吨级矿船11艘次,完成铁矿石吞吐量1334万吨,引领着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迈入“超级巨轮”时代。

谁又能想到这两块生机勃勃的创业热土,当年均是弹丸渔村?这是习近平独具慧眼、亲自选定的两块“宝地”。

往事历历在目。钟达清晰记得,2003年5月14日,习近平从嵊泗坐船回舟山本岛,在船上听取跨海大桥的汇报,第二天,习近平专程来到金塘调研,亲自察看金塘大桥选址,仔细听取了金塘大桥的两套选址方案汇报。当

得知金塘岛弹丸之地竟有27公里长达15米以上的岸线后,习近平来到金塘大浦口岸段考察,叮嘱周围的干部:这是一块宝地,是很好的天然良港,开发的前景广阔。

无独有偶。2005年6月13日,习近平登上岱山衢山岛再次考察舟山深水岸线资源。他指出:随着大小洋山和宁波舟山港建设的加快,六横岛、金塘岛、衢山岛作为尚未开发的宝地,资源优势日益显现,嵊泗、岱山的区位优势也日益凸现,舟山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习近平深谋远虑的擘画,历届省委与甬舟人民谨记在心,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

2005年5月,金塘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动工兴建,2010年7月,1号、2号深水泊位投入试生产。今天,大浦口码头运营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已达13条。

2009年,衢山镇鼠浪湖岛上2000多名原住民居民完成了整岛搬迁,随即开始“移山填海”的庞大港区建设工程,前后开山达580万立方米,填海面积积达90万平方米。2013年宁波舟山港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正式开工。今天,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

2015年5月,一个舟山人民阔别已久的熟悉身影,千里来寻故地,习近平总书记第十四次跨海登岛、重访舟山。当年,要把舟山放在国际上、放在全中国、放在浙江省这样的位置上去考虑,“开放发展宏图,正在舟山走下蓝图、化作实景”。习近平总书记欣慰地说:舟山这几年发展变化很大,现在的样子已完全认不出了。

桥起大洋,港通天下。连岛工程告捷,另一盘习近平念兹在兹的开放发展“大棋”密集落子、全盘皆活。

港口,开放发展的门户,在习近平开放发展布局中举足轻重。

2002年12月,习近平首次调研宁波时指出:如果说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那么,开放应当是宁波最大的优势,只有把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这两个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2003年8月18日,在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发挥我省的区位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大进大出”经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两头在外”,推动开放型经济再上新台阶。

可彼时浙江,囿于体制束缚,沿海港口各自为战,低价争揽货源时有发生。宁波、舟山两港,虽处同一海域,使用同一航道,坐拥同一经济腹地,但港口的规划、建设、营运、管理却相互分割,岸线资源难以优化配置。2004年,宁波港年集装箱吞吐量仅400万标箱,在大陆港口也排不进前三,而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也仅7200多万吨,居我国大陆第九位。

百川归海,有容乃大。习近平认为,发展海洋经济,必须遵循资源共享的开放属性,当务之急是“加快宁波舟山港一体化进程,加快开发大港口、建设大通道、发展大物流,形成以宁波舟山深水港为枢纽,温州、嘉兴、台州港为骨干,各类中小港口为基础的沿海港口体系和现代物流系统”。

2005年12月20日,在习近平果断决策下,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他亲自前往揭牌。时任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令红仍然记得习近平在揭牌仪式上的铿锵话语:“港口兴,则城市兴;港口兴,则经济

兴。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整合宁波港和舟山港资源,实现宁波舟山港一体化,是面向未来的必然趋势!”

2006年1月1日,宁波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品牌、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继续深度整合,一个崭新的东方大港雄姿初露。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习近平对两港一体化始终紧抓不放。2006年5月,他专程带着李令红在内的浙江代表团赴美考察全球著名的组合港——纽约、新泽西港,语重心长地嘱咐李令红,宁波舟山港有着优越的深水岸线条件,潜力很大,一定要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天造地设的黄金组合,两港“金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006年12月27日,宁波舟山港挂牌仅一年,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达到700万标准箱,习近平亲赴码头,按下了第700万标箱的起吊按钮。2008年11月,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年吞吐量首次突破1000万标准箱!李令红向已到中央工作的习近平写信报喜。习近平特地让秘书打电话祝贺,希望宁波舟山港继续做大做强,走在前列。

习近平的殷切嘱托成为浙江港口发展奋斗的目标。2015年9月,省海港委设立,省海港集团成立,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隆重揭牌,两港真正实现了以资本为纽带的实质性一体化。2016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了9亿吨,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2156万标准箱,位列全球第四,成为衔接服务中西部广大腹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支点。

拆篱破壁 八面风来

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习近平

改革与开放,血肉相连。没有改革,开放是无源之水;没有开放,改革行之不远。进入21世纪,面对先发优势不再、体制活力衰减的浙江发展阵痛,两个问题始终拷问着我们这个陆域小省:

一个是如何扫清阻碍扩大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抓住入世机遇,走在开放发展前列?一个是如何洞穿地域行政壁垒,拆除部门利益藩篱,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2004年,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在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坚持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要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开放体制创新,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这一习近平重要开放发展思想由此提出。这也许可以追溯到习近平一年前的“开放之旅”。2003年3月27日,习近平率团考察上海、江苏归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布局“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提高我省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在会上提出:“我们要学习沪苏之长,降低门槛、拆除围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现代理念和服务意识”。

习近平这一重要指示,为浙江打造开放发展的软环境统一了思想。浙江以全面提升发展环境为目标的“机

关效能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旋即上马,一系列服务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组合拳”同步推出。不断深化国有外贸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改革、在全国率先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建立“走出去”的专项扶持基金、扩大企业出口信用保险。

2004年2月2日,全省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大会举行。习近平在会上直指不适应入世后全球开放新格局的体制机制障碍。他指出:特别是面对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新形势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新考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显得尤为迫切。

机制羁绊之痛,改革红利之重,从“鸡毛换糖”起家、如今商行天下的义乌最有切肤之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来义乌设立办事处的境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作为县级市的义乌,很多涉外业务都无法开展。原义乌市商务局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科科长朱军回忆起第一次接待境外客商的情景:一家澳门企业要在义乌设办事处,朱军便带着他往杭州跑了四五个部门,找到负责部门下设的服务中心,一问光是表格就要填二十份,并对雇用人员作了诸多限制,这名客商打了“退堂鼓”,“黄鹤一去不复返”。

义乌人不会忘记一个小小的改革动作得到了习近平的亲切关怀。2002年底,义乌365便民服务中心投用,首批28个部门入驻,涉及各类审批、审核、核准及服务类项目共160项,其中就包括了“代办”外商投资审批等涉外业务办理。中心开业两个月,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时任省委书记、代省长习近平。

习总书记对中心是否便民、如何便民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中心内部机构设置情况、可办事项、便民效果,还跟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时任义乌市365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现任义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董利明陪同习近平从中心一楼看到二楼,一路上她详细介绍了中心的情况。习近平指出,“政府办便民服务中心,减少了办事程序,可以让群众少跑腿、少花钱,这很好。临别时,习近平勉励服务中心,好好总结经验,贵在坚持”。

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类似的便民服务中心在浙江全省迅速铺开。到2004年,全省各地各级政府已经建立了80多个各类服务中心,大大简化了办事流程,也规范了行政行为。到2007年,全省所有市县全部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或行政服务中心。

强县扩权,义乌再迎开放发展利好。2006年11月,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这是为义乌量身定制的改革,一次性赋予一个县级政府百余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这次扩权中,外国人在义乌就业许可、邀请外国人来华签证通知审批、因公出国(境)任务审核审批、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等项目,都被下放到义乌这个县级市,为义乌的开放崛起解除了体制束缚。

马来西亚珠宝商郭集福回忆,他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义乌做生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他萌生了到义乌开店的想法,但是当时外国人还无法直接从事个体经营业务。2004年在国际商贸城租了店铺,但是借用的是义乌朋友的身份证,一直到2006年政策放开,领到就业证,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公司。

(下转6版)